

認識與想像臺灣的社會經濟史： 1920-1930 年代臺灣社會史論爭意義之重探*

林文凱**

摘 要

1920-1930 年代，東亞各地發生社會史論爭之時，臺灣也發生了影響深遠的社會史論戰，當時西方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等近代性思潮大量引入臺灣，尤其以馬克思主義為主的社會主義思潮，深刻影響了知識分子對於社會變遷的近代性認識與想像。參與論爭的當事者依照不同理論觀點，對於臺灣與中國的近代社會經濟史作出不同的觀察，並據以提出對立的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造方案。1980 年代晚期以來，隨著政治民主化言論空間大開，臺灣文學史與政治思想史學者重新關注這一論戰，詳細挖掘了這場論爭的內容與其歷史影響，並用以介入當時臺灣的政治與社會議題。值得注意的是，1990 年代以來社會經濟史學界對近代中國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的認識已有重大改變，西方與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也已完全更新，但臺灣學界對該論戰的討論似乎仍本於之前的學術成見而展開，以致分析尚有許多不足之處。本文根據晚近以來對於社會經濟史以及社會主義史的研究成果，重新定位這場論爭與運動的歷史性質，以及其對當代臺灣歷史的意義。

關鍵詞：臺灣思想史、臺灣文學史、中國改造論、臺灣社會經濟史、全球社會主義史

* 本文部分內容乃國科會研究計畫獎助成果之一，計畫編號：NSC101-2410-H-001-078。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3 年 9 月 21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重返臺灣的近代」學術工作坊，會中承蒙黃美娥教授、許雪姬教授與張重崗教授提供寶貴修改意見，謹在此致謝。另蒙本刊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修正意見，非常感謝。然文中如有任何問題，仍由筆者自負。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投稿日期：2013 年 10 月 28 日；通過刊登：2014 年 6 月 16 日。

- 一、前言
 - 二、日治中期的臺灣社會史論爭
 - 三、近年來清代與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成果對於過去經濟史觀的批判
 - 四、戰後以來西方與日本社會主義實踐與思想史的轉變
 - 五、結論
-

一、前言

日治中期，即 1920-1930 年代，是臺灣政治史與文化史上的重要年代，臺灣政治與文化菁英為了反抗殖民統治、爭取政治權力，推動了各種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對於臺灣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等近代思潮的傳播與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並開始認識與想像臺灣的近代政治、經濟與文化之歷史。主要運動包括爭取臺灣自治權利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934）、訴求文化啟蒙的臺灣文化協會之成立（1921-1926）與其後的左、右派分裂和瓦解（1927-1931）、臺灣共產黨的成立與瓦解（1928-1931）、臺灣農民組合的建立與瓦解（1926-1929），以及臺灣民眾黨的成立與解散（1928-1931）、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建立與瓦解（1930-1937）等。¹

戰後初期臺灣的自由主義以及左翼運動雖短暫復甦，旋因來臺國民黨政府在政治與文化領域的嚴密控制而遭到嚴厲壓制，尤其在兩岸對峙的反共國策下，左派思潮幾乎匿跡。同一時期國民黨政府也刻意壓制臺灣歷史的研究，尤其是日治時期的研究，以上這些政治與文化運動更是學術禁忌。其後 1980 年代晚期解嚴

¹ 有關這些事件的主要經過，參見以下幾套普遍利用的史料：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戴國輝解題，《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東京：綠蔭書房，1986）；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 年再版）；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大事件紀錄，參見葉榮鐘，《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

前後，臺灣政治與文化空間的控制稍稍鬆綁，各種民主與自由主義的文化思潮開始傳播，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也不再是禁忌。知識文化界乃重新探究日治中期以來的政治思想與文學思潮，並以其作為歷史先例用以對當時臺灣的政治改革與文化啟蒙運動發聲。²

日治中期臺灣社會史論爭，包括一連串的中國改造與臺灣社會改造論爭，主要是運用 1920-1930 年代流行於蘇聯與東亞的第三國際之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來分析中國與臺灣的社會經濟史，並據以提出有關中國與臺灣社會的革命或改良構想。應注意的是，1990 年代以來，中國與臺灣近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陸續有了新的研究開展，並生產出很多新的經驗研究成果。然而，臺灣政治思想史與文學史學者如陳芳明、吳叡人、方孝謙、陳翠蓮等人在研究這些論爭時，³ 主要關切其中涉及的民族主義史觀等政治文化議題，因而很少探討當時作為歷史言說主題的社會經濟史議題；即使有所論及，通常也只根據論爭當事人的文本進行討論，很少參酌新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探究這些言說是否足以適切描繪當時的社會經濟現實。至於另兩位左派史家陳映真、邱士杰，⁴ 因為仍堅持第三國際的社會

² 有關臺灣戰後的政治與文學史的簡要系譜，參見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年第 2 版）；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³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陳芳明，〈「中國改造論」：論戰與 20 年代臺灣左翼思想的傳播〉，收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第六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延續與斷裂〉（臺北：該院，2005），頁 183-201；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43-110；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 2（2006 年 6 月），頁 127-218；吳叡人，〈誰是「臺灣民族」？：連溫卿與臺共的臺灣解放論與臺灣民族形成論之比較〉，收於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 199-229；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方孝謙，〈一九二〇年代殖民地臺灣的民族認同政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0（2000 年 12 月），頁 1-46。

⁴ 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6: 9=189（2000 年 7 月），頁 138-160；陳映真，〈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16: 11=191（2000 年 9 月），頁 138-161；陳映真，〈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臺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結束爭論的話〉，《聯合文學》17: 2=194（2000 年 12 月），頁 148-172；邱士杰，〈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史繹》35（2007 年 11 月），頁 69-140；邱士杰，〈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收於文訊雜誌社編，〈陳映真創作 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革命史觀的正確性，因此反覆援引馬克思與列寧等人的理論以申論論爭當時左派菁英社會經濟史認識的正確性，並用以批判陳芳明等人有關臺灣民族主義歷史詮釋的問題。

因為篇幅所限，本文不準備參與前述學者針對社會史論爭中涉及民族主義與階級史觀的諸多爭辯。本文關切的是，臺灣社會史論爭的核心主題是中國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的認識，其所提出的社會改造方案之有效性，邏輯上又是基於這些認識的有效性。然而，陳芳明等人以及陳映真、邱士杰等既有研究，卻都未曾仔細討論左、右派菁英的社會經濟史認識到底是正確的「歷史認識」，還是受到理論觀點與革命方略誤導的「錯誤想像」？因此，本文以為有必要參照近年來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來重新探討這一社會史論爭的歷史意義。⁵

另一方面，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國陷入冷戰體系下，一方是美國和北約組織領導的自由民主制之資本主義政體，另一方則是以蘇聯和華沙組織為首的一黨專政之共產主義政體。共產主義政黨的國家基本上依照第三國際的革命實踐綱領，依序推進非資本主義模式的社會主義發展，然而革命並未成功，1989年前後蘇聯與東歐共產體制瓦解，開始模仿資本主義政體的社會發展方略。而資本主義政體的各國禁止第三國際設定的暴力社會革命，但是原為第二國際成員的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除共組社會黨國際為名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外，並陸續透過合法的議會民主制掌握各國政權，推動或促進了歐洲社會福利體制的建立。⁶ 至於東亞發生過社會史論爭的日本、臺灣與中國，前兩者屬於資本主義政體，先後建立了與西歐類似的社會民主體制；而中國則屬於共產主義陣營，戰後從內戰中取得政權後，參考第三國際的相關綱領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

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9)，頁 241-299；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日本學界也有左派學者採取類似取徑，肯定論爭中的左派菁英之歷史言說，參見小林文男，〈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な思考：「中国改造論争」の意味と周辺(1)〉，《アジア経済》11: 9 (1970年9月)，頁 40-51；小林文男，〈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な思考：「中国改造論争」の意味と周辺(2)〉，《アジア経済》12: 2 (1971年2月)，頁 14-30。

⁵ 值得注意的是，撰寫過陳逢源傳記的社會經濟史學者謝國興，曾為文分析過這一社會史論爭，他在結論部分以隱微筆調婉言主張右派陳逢源的觀點應該是比較正確的。但他在文中並未說明其判斷依據。參見謝國興，〈中國往何處去：1930年前後臺灣的左右論辯〉，《近代史研究》2003: 2=134，頁 44-76。〔按：中國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

⁶ 〈Cold War〉，「Wikipedia」，下載日期：2013年9月15日，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

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未成功，因而於 1978 年之後在經濟上放棄社會主義模式，轉採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發展政策。

隨著西歐社會福利體制的成功與共產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西歐與日本等地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也產生全盤的轉變，除批判第三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詮釋觀點，也慢慢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原有目標，追求以資本主義生產、社會福利主義分配的新政略目標。與此同時，發展出相當豐富多元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於各類政治、經濟與文化議題提出新的馬克思主義批判觀點，或者進一步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出後殖民與後現代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學界討論日治中期社會史論爭時，普遍都注意到當時臺灣與日本、中國和第三國際左翼運動與思想的網絡關係與連動的影響。但卻很少把這一受到第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引發的社會史論爭，放在戰後以來世界與東亞的社會主義運動史與思想史的整體脈絡下加以考察，尤其沒有注意到這些新的社會主義運動史與思想史對於第三國際觀點與立場的批判與揚棄。

因此，本文以下將根據晚近對於中國與臺灣社會經濟史以及世界和東亞社會主義史的新研究，重新定位日治中期這些論爭與運動的歷史性質，以及其對當代臺灣歷史的意義。以下分成幾個部分討論這些論爭，首先，簡要介紹由陳逢源、許乃昌、蔡孝乾、連溫卿與臺灣共產黨等右派與左派人士，所引發的中國改造與臺灣改造論爭。其次，說明近年來國際與臺灣學界有關清代以來中國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進展，藉以指出日治中後期臺灣左派與右派思想家的社會經濟史認識的對錯之所在。其三，討論西方與東亞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史的轉變，以提供重新考察日治中期社會史論爭意義的更大參照性空間。最後，簡要說明我們應如何定位日治中期這場重要思想論爭的歷史意義，認清當時臺灣左、右派人士有關臺灣社會經濟史言說中的「認識與想像」。

二、日治中期的臺灣社會史論爭

約於 1920 年前後，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等近代思潮同時傳入臺灣。當時無政府主義的思潮並未有效擴散，反而較早就已經消退了，但社會

主義與自由主義持續興盛並擴展開來。一開始左、右派政治與文化精英合力推動兩個重要的反抗殖民統治的運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文化啟蒙協會活動，然而隨著左派思潮的增強，左派人士開始不滿以右派民主抗爭為主調的既有活動型態與主張，逐漸地兩派人士的衝突開始浮上檯面。就在 1927 年臺灣文化協會內部的左、右派分裂前，右派（陳逢源）與左派（許乃昌和蔡孝乾等人）在當時本島人最重要的公共論壇《臺灣民報》爆發了所謂的「中國改造論爭」。這場論爭可以說把西方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自的現代性認識與想像，尤其是社會經濟史觀與社會實踐路線，以對照方式傳播給當時的閱聽大眾。

這場論戰始於 1926 年 8 月底，陳逢源在《臺灣民報》上發表了〈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討論中國的局勢與改革之道。他一開始就引述馬克思的理論，並將其詮釋為「社會進化論」，宣稱馬克思主張社會進化有其必然的階段過程：資本主義若沒有發展到極致，無法有社會主義的實現。換言之，他並不否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但認為中國社會必須先發展出資本主義，才能進一步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實踐。

陳逢源認為中國社會雖已有零星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大部分仍然處於「封建體制」之下。⁷ 當時的軍閥割據與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造成封建體制的延續，另一方面也造成中國的資本主義無法發達。他認為中國的狀況與俄國不同，中國處於帝國主義侵略與支配下，因此不可能推動俄國共產革命的路線。中國必須追求國家的統一方能廢除帝國主義以及軍閥割據，也才能促成資本主義的發達。但他認為與其以武力統一，不如推動工商階級的勢力為良方，因為他們為了自身利益會追求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的撤廢，並協助打敗軍閥以及封建體制。陳逢源也指出想要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達，應該鼓勵中國人集資組成股份有限公司，才能與擁有龐大資本的外國資本家對抗。總之，其中國改造論「總講兩句，不外是由資本主義這條路跑去便是了」。⁸

⁷ 使用西方社會史家用來描繪西方中古社會的「封建」概念來描繪現代化以前的傳統中國，是 1920 年代社會史論戰以來的思想繼承結果，這一概念被當時左、右派的多數學者所普遍接受，但這其實是錯誤的概念套用，參見下一節的相關討論。

⁸ 芳園（陳逢源），〈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0（1926年8月29日），頁8-10。

這篇文章立刻引發了左派社會主義者許乃昌的激烈回應，他對陳逢源的馬克思主義理解提出質疑；並宣稱依據其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狀況的「精密研究」，陳逢源並未真的認識中國，他的經驗觀察是明顯錯誤的。許乃昌主張馬克思的重點不只是社會進化論，而是必然且必須要推動革命；且他認為所謂的軍閥根本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的資本主義看似已有發展，但實際上都掌握在外國資本家手中，而只要外國資本主義在的一天，中國資本主義就不可能發展。

許乃昌依照其對當時處於國共合作時期的中國政治之觀察，主張國民革命有兩條路線：一是資產階級指導的妥協路線，國民黨右派戴季陶即如此主張；二是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路線，即國民黨左派汪精衛與蔣介石所領導的〔按：當時蔣介石尚未清黨〕，強調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正朝向第二條路行進。許乃昌強調各國進化的路徑並不相同，中國現在既非封建主義也非資本主義，而是處於帝國主義時代特殊的「殖民地式中間階段」。如同俄國革命一樣，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有可能無須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就能夠經由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跳躍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⁹

其後，另一位左派重要成員蔡孝乾（1928 年臺共幾位創黨成員之一）則提出了類似於許乃昌的意見，強調因受到國際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雙重壓迫，中國已存在國際資本主義，且外國勢力已經掌握所有的資本主義力量，因此中國自身朝向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即使中國的商工階級成立，鑑諸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經驗來看，他們並無實力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且往往成為反動者。因此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一舉完成經濟與政治革命，解救廣大人民的痛苦。¹⁰

之後陳逢源對於許乃昌的批評提出詳細的回應，除了重複前文的要點之外，他指出：一、俄國革命的性質與成果是值得懷疑的，那只是政治革命而非社會革命，只有共產黨員的獨裁，而非無產階級獨裁；二、中國的現狀，包括人民的生活願望，都比較適合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或讓農民成為小資本家，而非實行共產主

⁹ 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6（1926年10月10日），頁10-13；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臺灣民報》127（1926年10月17日），頁10-12；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臺灣民報》128（1926年10月24日），頁9-11；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完)〉129（1926年10月31日），頁9-11。

¹⁰ 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34（1926年12月5日），頁10-13。

義；三、中國的重點是統一國家、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這是所有階級的要求，因此應先解救民族，以後再談解放階級；四、中國若能統一，取消不平等條約就能夠進入資本主義，在這同時主政者也必須實行社會政策，限制土地兼併、國際與私人資本的壟斷、實施勞動保護法令，並保障組織和言論的自由。¹¹

這場論戰最後，是許乃昌的一個再回應，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主張自己是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為前提，並相信「無產階級將會創造新的歷史」。他批評陳逢源既未從事實際的中國資本主義研究，也未經過實地的研究調查，所提出的經驗、數據都是抄襲而來。與其相比，他主張自己則有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經驗研究的支撐。¹²

中國改造論討論的雖是中國，但對於論戰者來說言外之意當然是針對當時臺灣政治抵抗運動實踐走向的辯論。在這場辯論後不久，1927年初臺灣左、右派政治運動者就正式分裂，左派連溫卿在臺灣文化協會臨時大會上奪權成功，右派蔡培火、陳逢源、蔣渭水（先右後左）等人則退出文化協會，並重新籌組臺灣民眾黨。1928年臺灣島外的左派人士分別在日本與中國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的協助下籌組了臺灣共產黨，雖經上海日本警察的鎮壓，但仍在臺灣展開活動。¹³

這段期間，臺灣民眾黨與臺灣共產黨陸續提出一些針對臺灣改造的政治綱領與政治論述，左、右派人士也提出他們對於臺灣社會與歷史的看法，並藉以提出他們屬意的適當政治實踐綱領。本文特別關切的是，他們對於臺灣歷史，尤其經

¹¹ 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一）〉，《臺灣民報》130（1926年11月7日），頁11-12；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二）〉，《臺灣民報》131（1926年11月14日），頁11-12；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三）〉，《臺灣民報》132（1926年11月21日），頁10-11；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四）〉，《臺灣民報》133（1926年11月28日），頁11-12；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五）〉，《臺灣民報》135（1926年12月12日），頁8-9；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六）〉，《臺灣民報》136（1926年12月19日），頁11；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七）〉，《臺灣民報》137（1926年12月26日），頁11-12；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按：造論〕（八·完）〉，《臺灣民報》139（1927年1月9日），頁12-13。

¹² 許乃昌，〈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上）〉，《臺灣民報》142（1927年1月30日），頁11-12；許乃昌，〈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下）〉，《臺灣民報》143（1927年2月6日），頁11-14。

¹³ 有關臺灣文化協會分裂與臺灣共產黨組黨過程，參見吳叡人，〈誰是「臺灣民族」？：連溫卿與臺共的臺灣解放論與臺灣民族形成論之比較〉，頁199-229；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29-244。

濟史提出怎樣的看法，以及對於臺灣的經濟發展（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提出怎樣的實踐策略。

首先，是 1927 年 9 月 13、18 日，臺灣民眾黨在臺南舉行的「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演講會。演講成員包括韓石泉、王受祿、陳逢源、盧丙丁、彭華英、謝春木與蔣渭水等臺灣民眾黨的右派成員，他們的觀點基本上延續陳逢源在中國改造觀論爭中的想法，主張臺灣的資本主義尚不發達，並無本土的大資本家，主要的政治、經濟權力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且臺灣人的文盲普遍存在，人口大多是農民，並無大量近代產業的勞動者。因此認為政治運動的重心，不應是社會主義的階級革命，而是團結起來向日本人要求政治與經濟上的平等，並追求知識上的啟蒙；至於貧窮等社會問題，則應該採用社會改良主義的方式來解決。¹⁴ 總之，這些右派成員的論點明顯是在回應當時奪權成功的臺灣文化協會左派成員，強調階級運動不可行，而且民族團結革命應該優先於階級革命。

這場演講之後，則引發了左派成員黃石輝的批判性回應，針對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優先性，主張應該是階級運動優先而非右派所說民族運動優先。因為歷史顯示民族鬥爭只講求民族解放，鬥爭成功時往往僅對資本家與大地主有利，工人與農民仍然受到壓迫。所以民族運動只是部分的，民族運動其實是階級鬥爭的一部分，而階級鬥爭才是全體的，方能令大部分勞動人民獲得解放。¹⁵

其次，連溫卿在 1928 年針對中國改造論爭作出評論，認為這場長達將近半年的論爭，雙方的主題並非僅是表面的「中國改造」，而是有關「臺灣改造」的辯論。雙方爭辯的是「臺灣有資本主義也是沒有？」連溫卿認為右派的想法是：「臺灣雖沒有所謂的資本家，那自然就沒有資本主義的存在，所以臺灣要豫先使臺灣人的資本家發達起來，能夠到達和日本資本家對抗的地位，才是合理的，欲著到這個目的，需要以民族運動去進行的。」左派許乃昌的觀點則是：「臺灣雖有資本家也沒有發展到能夠獨立的地位，因為在臺灣的資本主義，已經鞏固了地盤

¹⁴ 〈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一）：在臺南開會演講大要〉，《臺灣民報》176（1927年10月2日），頁7；〈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二）：在臺南開會演講大要〉，《臺灣民報》177（1927年10月9日），頁8；〈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三）：在臺南開會演講大要〉，《臺灣民報》178（1927年10月16日），頁8；〈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四）：在臺南開會演講大要〉，《臺灣民報》179（1927年10月23日），頁8；〈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五）：在臺南開會演講大要〉，《臺灣民報》180（1927年10月30日），頁8。

¹⁵ 黃石輝，〈「改造」之政〔按：改〕造（一）〉，《臺灣大眾時報》9（1928年7月2日），頁13-14；黃石輝，〈「改造」之改造（二）〉，《臺灣大眾時報》10（1928年7月9日），頁11-13。

的緣故，而被壓迫、榨取的臺灣人，不是只限於少數資本家及地主而已，此外還有最大多數的勞動者及農民的存在，所以欲解放臺灣人，應該要主張階級爭鬥」。¹⁶

連溫卿從左派立場出發，認為右派的主張只是以少數的利害關係為根本要求，因此自然能和殖民當局的內地延長主義一致，也就是以獲得政治上的獨立為止；而左派的主張是以臺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為目的，且無產農民與勞動者的利害關係和地主與資本家並不一致，因此主張當然也就有所不同。從這個討論中，可以發現到右派陳逢源主張臺灣民族運動，應該先促進臺灣本土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發達，然後才能談進一步的社會改革；然而左派則認為這樣的運動只會有利於少數資本家，無益於廣大無產農民與勞動者的利益。而潛藏在左派與右派不同主張的背後，則都是相信自己的經驗觀察之正確性，以及由此得出的實踐主張之可能性。

接著，我們注意到 1928 與 1930 年，連溫卿對於日本統治下臺灣社會經濟演變的分析，基本上是一種殖民地臺灣的經濟發展受到母國發展制約的「依賴理論」觀察：一、臺灣在晚清時期，尚未脫離封建制度；日治時期臺灣開始資本主義化，而且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在日治中期臺灣也逐漸高度資本主義化。二、日治中期，臺灣社會已經分化成五個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轉化而成的新興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受薪階級與無產的工農階級，這其中封建地主階級與新興資產階級都已經被日本資本家收編，至於受薪階級則有可能支持工農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運動。三、日治中後期臺灣已經高度資本主義化，日本殖民政權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因此臺灣應該進行的是社會主義革命。¹⁷ 如同吳叡人的分析，連溫卿提出的是一個日本山川——勞農派的社會經濟史之分析與一階段革命論的主張。¹⁸

另一方面，1928 年臺灣共產黨也提出其〈政治大綱〉，該文件揭示了另一個「臺灣民族、民主與經濟發展的現代性史觀」：一、臺灣最初的住民是野蠻人生

¹⁶ 連溫卿，〈臺灣社會運動概觀〉，《臺灣大眾時報》創刊號（1928年5月7日），頁15-16。

¹⁷ 連溫卿，〈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6（1928年6月4日），頁12-14；連溫卿，〈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二〔按：三〕）：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7（1928年6月11日），頁13-14；連溫卿，〈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8（1928年6月25日），頁14；連溫卿，〈台灣に於け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実態〉，《史苑》35:2（1975年3月），頁61-83。

¹⁸ 吳叡人，〈誰是「臺灣民族」？：連溫卿與臺共的臺灣解放論與臺灣民族形成論之比較〉，頁209-210。

番，在十六世紀前半葉臺灣受到荷蘭與西班牙的殖民。1660 年代鄭成功將荷蘭與西班牙殖民政權逐出臺灣。漢人逐漸壓迫生番，將其逐入深山之中。土地完全被鄭氏與其部屬所分割占有。此後中國南部移入臺灣的漢人日增，所謂的臺灣民族就是此等南方移民渡海來臺所結成的。當時鄭成功一族對臺灣的統治完全建立在「封建制度」之上，同時也保存民族遺傳的風習。二、其後，清朝派遣封建領主駐在臺灣，依然採用封建制度統治此地。然後隨著時日推移，封建制度也日漸動搖。促成此種歷史變遷的主要動因是，當時臺灣人與西方諸先進國家開始貿易，內部的商業資本逐漸抬頭，因此迫使封建制度逐漸走上崩潰的道路。

三、十九世紀中葉，當臺灣與中、英、荷等國的商業關係逐漸繁盛起來，封建制度逐漸崩潰，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展開，進入經濟變革時期，反抗滿清的民族運動也逐漸高漲。四、這時中日發生戰爭，清朝戰敗議定臺灣割讓，民族運動轉變為臺灣民主國的創設，主要目標為對抗日本侵略臺灣。這一革命運動的主力是資本主義的中層地主、商人及激進武士，他們雖然表現出一種全民大眾性的國民革命型態，但由於臺灣的資產階級尚未成熟，這個國民革命遭到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壓抑。民主革命尚未成功，但革命過程中由於內部資本主義的成長，以及日本帝國主義掠奪性的改革，最主要的土地問題實際上起了一大變化，這是革命所收到的唯一效果。五、臺灣民主國雖然原擬建立一個民族獨立的國家，邁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但革命未成、已被日本強奪而成為殖民地，因此仍遺留很多封建殘餘。另一方面，殖民以來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完全是倚賴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成長起來的，而統治臺灣的日本帝國主義本身也存在著很多封建殘餘，因此現在的臺灣事實上還存在著很多的封建殘餘。

六、進一步來說，日治中期臺灣的經濟型態，乃是占據主要資本份額與支配地位的日本壟斷資本、少數幼稚的本土資本以及落後的農村非資本主義要素並存，這些難以解決的矛盾並存的狀態，正是臺灣革命發展的主要動因。七、臺灣的階級狀況，包括日本資本家、反動的本土資產階級、進步的本土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地主、自耕農、貧農與農業勞動者、勞動者階級等。這些階級之中親日的包括日本資本家、反動的本土資產階級、大地主等階層，其餘階層則有抗日的傾向，支持民族革命。八、就革命傾向來說，一部分左派人士忽略了臺灣是日本殖民地以及臺灣封建殘餘濃厚的歷史事實，以致犯了幼稚病，拒絕

民主主義的革命，而希望一步就施行社會主義革命。臺灣革命最重要的問題乃是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農民正是農村革命的主人公，然而農民本身經濟性格是散漫的，並非革命的主導者，而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因此臺灣工農必須聯合推動民主主義的革命，並將封建地主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土地沒收、分配給農民，完成反帝與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再進行進一步的社會主義革命。¹⁹

如果與共產國際的東亞革命理論、日本講座派理論以及中國革命理論相互對照就會發現，這就是所謂的二階段革命論。主張臺灣社會還不是一個成熟的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前述連溫卿基於山川勞農派主張的一階段革命論，而主張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再推動社會主義革命。²⁰

三、近年來清代與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成果 對於過去經濟史觀的批判

1990年代臺灣民主化之後，如陳芳明、吳叡人、方孝謙、陳翠蓮、陳映真、邱士杰等臺灣政治思想史與文學史研究者，都對上述的社會史論爭進行過深入專門的討論。針對論爭中社會經濟史言說的處理方式，基本上有兩種：首先，如陳芳明、吳叡人、陳翠蓮、方孝謙等人，基本上並未討論這些歷史論述中左、右兩派的經濟史概念與其認識是否正確的問題，而只關切這些歷史論述中有關民族主義與階級論述的內涵與其演變的問題。²¹ 的確，因為政治與文化意識與經濟現象

¹⁹ 此一大綱，原文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戴國輝解題，《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会運動史》，頁601-612。從目前的臺灣史研究成果來看，這個大綱雖然有現代性啟蒙的重要意涵，但其對於臺灣民族建構、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的認識皆有頗多錯誤，本文以下將僅針對經濟發展的說法加以檢討。

²⁰ 嚴格來說，要理解臺灣社會史論爭的經濟史論述，必須將其與蘇聯主導的第三國際、日本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等政治活動，以及蘇聯內部的革命史觀論爭、日本資本主義論爭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等學術論辯放在一起討論，分析其在政治與學術組織、人員與思想流派間的詳細關聯，方能理解其共同關聯以及在個別社會的獨特面向。但本文主要關切的是這些經濟史論述被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推翻的過程，而非這些社會史論爭在東亞各地流通的機制，因此這些議題此處不擬加以討論。有關中國社會史論爭與日本資本主義論爭的學術關聯，可參見緒形康，〈1930年代的封建遺制論爭、資本主義論爭におけるアジアの影〉，收於緒形康編，《アジア・ディアスポラと植民地近代：歴史・文学・思想を架橋する》（東京：勉誠出版，2013），頁193-219。但他的這一思想史研究，仍因缺乏對於晚近經濟史研究的認識，而傾向認為勞農派的經濟史觀點是正確的。

²¹ 這些論辯豐富了我們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政治思想史的認識，但本文不是以此為主題，因此以下不細

僅有間接關聯，而且政治與文化意識涉及社會建構的成分，因此輕忽社會經濟史面向的詮釋分析並不一定會直接危及這些學者所處理的政治思想史之詮釋；然而，如同我們以下以陳芳明為例的分析，僅侷限於文本自身的「歷史敘事」，而忽略對於這些文本所欲表述的「歷史事實」之比對，在許多時候仍然會妨礙我們對這些政治思想運動提出完整的詮釋。²²

其次，如陳映真、邱士杰等偏向左統的學者，他們不只處理政治思想的議題，並對以上學者的詮釋提出批判，更重要的是他們本身是堅持第三國際理念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社會經濟史本身就是其研究主題。陳映真等人不僅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的正確性，同時也認為 1920-1930 年代臺灣共產黨與左派人士的經濟史考察基本上是正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僅是歷史研究者，而且是臺灣社會少數仍然信奉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的虔信者，相信第三國際時期在東亞發展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之社會革命理論，有在當代延續下來的應然價值與實踐可能性。雖然是以臺灣的社會經濟史為分析主題，但他們的分析除參照馬克思與列寧等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外，僅參考了矢內原忠雄、涂照彥（早期作品）與劉進慶的經濟史作品，幾乎完全忽略了 1990 年代以來，臺灣史學界豐富的清代與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

首先，我們注意到無論中國或臺灣改造論的分析者，基本上都採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觀點，將中國與臺灣的傳統社會定位為所謂的封建社會。一、馬克思主義根據西方不同階段的主要生產關係，概念化出人類社會演化的五個階段，原始共產社會、古代奴隸社會、封建農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是一套具有普世性的社會演化法則，依據這套法則西方社會在十六世紀前後以英國社會為首，才開始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慢慢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而東亞各國社會史論戰中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東亞社會包括中國與臺灣都是從十九世紀中葉受到西方衝擊之後，才開始從封建社會艱難地

述這些研究辯論的具體內容與貢獻和問題。

²² 必須澄清的是，筆者並不認為任何（包括目前最新）的社會經濟史研究，能夠掌握絕對的「歷史事實」，因此本文對於臺灣社會史論爭提出的新詮釋自然也稱不上是最終的歷史定論，而僅能是另一個「歷史敘事」。然而，如果我們承認人類的歷史是有所關聯（無論是社會間的橫向關聯，還是同一社會的貫時演變），而且所有的歷史都具有當代史的意涵（因此是從過去到現在以及從現在到過去的雙重考察），那我們在重新詮釋臺灣社會史論爭時，沒有理由不把當代的臺灣經濟史研究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思想的最新反省放入我們的討論中，以求得一種相對較佳的歷史詮釋。

走向資本主義化的道路。²³

1920-1930 年代，西方的社會科學，尤其馬克思主義剛引入東亞社會時，中國與臺灣左、右派學者們由於黨派意識與親身觀察的不同，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變遷如何定位有著顯著的對立，然而他們對於更早之前的傳統社會觀點則較為一致。左派與右派基本上都認為面對西方衝擊前的清代（中國與臺灣）社會是所謂封建停滯的農業社會。主要的生產關係就是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封建地主制關係，這種關係雖然與西方中世紀的領主與農奴關係有些微差異，但基本性質是相同的。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超經濟的身分性人格支配關係，而非一種經濟性的純粹契約關係，被綁縛在這種關係下的農民缺乏身體的自由，且社會階層相當固定，難以流動。地主從佃農手中收取的地租並非資本主義下的投資利得，而是一種藉由專制權力支持、維護的封建地租。同時在這種社會的物質生活中，市場與商品經濟即使有，也不太重要，主要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共同體經濟關係。

除了以上參與臺灣社會改造論爭的左、右派，實際上 1940 年代前期清代臺灣經濟史研究的開創者日籍學者東嘉生，也是採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和史觀來分析清代臺灣經濟史。²⁴ 比起前述臺灣左、右派知識分子來說，在臺北帝國大學從事研究的東嘉生有機會接觸到較多的史料，因此儘管他仍用封建經濟論來分析清代臺灣經濟，但已提出一些與前述知識分子不同的看法。他注意到清代的臺灣經濟雖然一開始也是建築在身分制的封建土地所有關係之上，而且以半鎖國的

²³ 1920 年代以來，封建概念在中國社會變成普遍化的泛化詞語，被用來形容各類保守、腐朽的社會關係，如封建婚姻、封建習俗、封建官僚。但若依照西方封建概念的原意來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周代可稱作封建時期，春秋戰國以來封建體制逐漸瓦解，秦漢以來則確立為郡縣制的王權社會。此後到民國創建為止，雖有部分時期或地區有封建體制的局部存在，但社會基本結構一直都以郡縣制為主體。有關封建論概念在中國社會史中的錯誤套用，參見 Arif Dirlik（德里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第四章，頁 80-116；馮天瑜，〈「封建」概念辨析〉，《社會科學戰線》2006: 5，頁 251-255；馮天瑜、樊良樹，〈關於「封建」概念的對話〉，《社學科學論壇》2007: 4(上)，頁 133-136。

另一個普遍用來指涉傳統中國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則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其內涵則與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農奴社會有密切關係。但這個概念因為被史達林定位為托洛斯基修正主義者的概念，基本上不為第三國際的多數東亞左派所採用。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在中國社會史的應用，參見 Arif Dirlik 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第六章，頁 156-193；魯凡之，〈東方專制主義論：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7）。

²⁴ 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矢內原忠雄，對於清代臺灣經濟史的認識，基本上與前一節臺灣左右派人士看法一樣，即臺灣的資本主義化始於十九世紀開港之時的外國商業資本，但真正的發展是起自日本殖民統治時。參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頁 41-42。

自給自足經濟為特徵，但在地主（大租戶）與佃農（小租戶）這種身分制的土地所有關係下，佃農的農奴性格成分極少，在其成立的當時，即帶有近代的市民社會性質。這是因為農產品市場的擴大，小租戶經由農產品的交易提高經濟實力，並且逐漸擁有土地典賣的小地主權，導致了封建地租關係的崩潰，也就是大租戶的地位低落與小租戶的地位抬頭。

但東嘉生認為這不是由臺灣社會封建體制的內部生成的，就是說不是其內部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十八世紀末外來的大陸商人勢力所造成的〔按：前面臺灣共產黨的政治大綱，則主張十九世紀中葉開港之後才轉變〕。這些外來商人瓦解了原來居於封建地主階層的大租戶之經濟基礎，並促成擁有土地實權的小租戶經濟實力的提升，許多小租戶則又進一步把多餘土地佃耕給現耕佃人，但這種佃作關係不是封建性關係，而是資本家的佃作制度。總之，東嘉生參考馬克思分析十六世紀以來英國封建社會瓦解所提出的論點，主張臺灣的封建地主（大租戶）是在十八世紀晚期市場經濟的衝擊下而逐漸轉型的。²⁵

這種想法儘管已經比 1920-1930 年代的封建停滯論更接近歷史事實，但實際上仍是不當套用了「封建」概念於臺灣的經濟現象上。近二十年來清代臺灣土地開墾史，尤其熟番地權史的研究者，如施添福、John Shepherd（邵式柏）、柯志明與筆者的研究顯示，清代臺灣土地開墾過程一開始就不是一種身分制土地所有關係，無論是大租戶、小租戶以及現耕佃人之間的兩層土地租佃關係，從成立起始就是一種經濟性的契約關係。而且其實來臺擔任墾戶、召集佃人從事開墾的大租戶（地主），很多一開始就是存著投資的心態來的，即利用開墾取得的大租權益進行米穀出口或地權買賣而營利。這些研究同時也指出，原先在臺灣平原上的原住民（熟番）土地的確為漢人所開墾，但他們的地權並非完全被掠奪，而是以收取番租的方式保留一定土地權益，他們也並未被趕入高山，而是部分留住原居地、部分遷移到沿山地區，幫助政府防守生番界。²⁶

²⁵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臺灣經濟史概說》（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頁 168-170、198-202。

²⁶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1）；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的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林文凱，〈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創設與流失：以竹塹社為個案的歷史分析〉，收於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頁 133-183。

進一步從農產品市場的發展來說，如同筆者清代臺灣米穀出口史的研究顯示，臺灣的貿易早在荷蘭與明鄭時代就相當發達，清代統治後不久儘管國際貿易（與東南亞和日本）就中斷，但與此同時臺灣與大陸間的兩岸貿易很快就發展起來，並超越之前的貿易量。因為臺灣僅生產農產品（一開始主要是米穀與蔗糖），無手工業的發展，因此所有的地主與佃農原本就需要把大量的剩餘農產品外銷到對岸去，否則無法取得家庭維生所需的手工業產品。²⁷ 換言之，清初臺灣的市場經濟就已經是農業與商業資本主義，清代臺灣並未經過所謂的封建經濟到資本主義的轉型過程。

事實上，不僅清代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完全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封建停滯論觀點，中國學界以清代中國為整體範圍的清代經濟史研究，戰後以來也慢慢修正直至完全否定了封建停滯論的說法。封建停滯論的說法是在 1930 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期間，開始成為解釋清代經濟的主流典範。1937 年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呂振羽提出了資本主義萌芽論的修正說法，主張明清之際中國的封建經濟達到高峰並且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現象（但仍是封建生產關係為主的社會），而且若非外國帝國主義入侵導致中斷，中國自身也將慢慢發展至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說法原本只是少數觀點，但 1939 年經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作了經典性的表述，肯定這一理論。在戰後，資本主義萌芽論因此成為官定的清代經濟史觀。這一史觀基本上主宰了 1950-1980 年代中國境內的清代經濟史研究。²⁸

1990 年代以後，封建論與相關的資本主義萌芽論等馬克思主義觀點，逐漸被中國經濟史家所拋棄。舊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慢慢有被兩個國外引入的新典範取代的跡象：首先是 1980 年代黃宗智的過密化論（involution），這個理論否定中國學界 1930 年代占據主流的封建停滯論，也不同意其後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黃宗智強調清代中國並非封建式的自然經濟，而是已經有著商品（市場）經濟的發展，但他強調這與同時期西方的亞當斯密式的市場經濟並不相同，其未能發展為真正的資本主義，也非因為外國帝國主義入侵所中斷。而是因為明清的商品經

²⁷ 林文凱，〈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的米穀輸出問題〉，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99-133；林文凱，〈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 2（2011 年 6 月），頁 215-252。

²⁸ 仲偉民，〈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學術界》2003: 4=101，頁 223-240；趙曉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術研究與論爭》（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

濟是一種人口壓力下驅動的經濟增長，人們的勞動生產率並未如同西方一樣的大量增長，因此中國的市場經濟無法如西方一樣導致資本主義的產生，人們的物質生活實際上並未提高，而是持續處於糊口的水平。²⁹

但是近年來原本佔據主流的過密化論，遭到 Kenneth Pomeranz（彭慕蘭）提出的大分流論（Great Divergence）之批判。彭慕蘭主張中、英兩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晚期為止的經濟型態都是所謂的亞當斯密式經濟，勞動生產率都有一定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提高，而且清代中國生活水平並不輸於英國。同時，中國的土地生產關係與土地、勞動和商品市場都是基於契約的自由市場，絕非封建這一概念所能詮釋，且其市場自由的程度未必輸於同時期的英國。他認為英國的經濟真正超越中國乃是在十八世紀晚期與十九世紀初率先發展出工業革命，也就是由商業資本主義步入工業資本主義的時候。而英國之所以能夠發展出工業革命，與其之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無關，而是因為美洲大陸的殖民以及英國煤礦特殊位置等偶然性的外在因素所致。³⁰

接著，我們看看中國與臺灣改造論的討論中，有關開港以來到日治中期的中國與臺灣經濟史分析，到底是陳逢源等人的右派說法，還是左派的許乃昌與蔡孝乾的說法能夠得到近代經濟史研究成果的肯認？還是兩者的說法都有問題？這個部分我們從中國經濟史的討論著手，事實上，許乃昌與蔡孝乾的中國社會改造論點，基本上就是中國社會史論戰期間左派學者參照第三國際論綱所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論」，該理論由毛澤東在 1930 年代後期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理論。³¹

²⁹ 黃宗智，《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規範認識危機及出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頁 131-169。

³⁰ Kenneth Pomeranz（彭慕蘭）著、史建云譯，《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關於彭慕蘭對黃宗智的批判筆者基本上同意，但對於中、西經濟分流過程與機制的機遇論觀點有所疑慮，不過，此處重要的是，如其所說清代市場經濟的性質與同時期的西方有其類似性，絕非封建停滯論所可解釋。參見林文凱，〈清代中國與近代早期英國（16-18 世紀）經濟發展的比較：以土地所有權制為焦點的分析〉，發表於河南大學法學院主辦，「中英比較視野下的國家、法律與經濟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2013 年 7 月 24-25 日。

³¹ 當中國社會史論戰之時，其實有些隸屬托洛斯基派與新生命派的學者主張，當時的中國已是一資本主義社會，不過這個觀點遭到蘇聯史達林主導的第三國際與中共理論家等的反對，尤其在毛澤東掌權、定調為半殖民地半封建論之後，更是完全沒有發展的餘地。參見魯凡之，《東方專制主義論：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頁 69-150；緒形康，〈1930 年代の封建遺制論争、資本主義論争におけるアジア〉，頁 195-200、203-207。

這派理論主張強調 1840-1940 年代的中國，是在帝國主義入侵背景下（半殖民地）、封建勢力殘餘嚴重的社會（半封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只有在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有所發展，而且也有本土的買辦與民族資本家出現，但這些資本家受到外國資本家的控制並成為其附庸；至於廣大的農村地區仍然處於封建停滯的狀態，封建地主持續透過高額地租等方式壓迫農民階級。且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與交互作用下，中國經濟將持續「停滯於一定狀態之下」。最終，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完成反帝與反封建革命的勝利，完成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並快速轉換到社會主義的革命。³²

這一個理論，主張 1840 年晚清開港以來的外國資本與帝國主義並未促進中國正面的經濟發展，而是造就中國經濟的嚴重災難與剝削（與前述的資本主義萌芽論說法相配合）；至於民初以來的軍閥與國民黨政府基本上都是帝國主義的附庸與工具，無力抵抗帝國主義的支配，而使中國社會淪落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不僅維護封建生產關係，同時也只保護如江浙財閥與孔宋家族等少數官商資本家的利益。然而這樣的理論，從現在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來看，比較像是 1920-1930 年代大量左派知識分子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下所發展出來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了破壞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刻意宣傳產物，並不是那麼合乎當時的歷史事實。

從現代歷史學的研究來說，相對於儒家王朝循環史觀，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是中國社會現代性史觀的開創理路之一，當然有其重要的學術意義。但好的歷史研究必須要有史料與史觀（概念與理論）的不斷對話、修正，而且史料與史觀都不能侷限於單一，必須多元而得以相互參照、辯駁。只有透過這樣的過程，從西方引入的學問才能完成本土化的繼受。然而，1920-30 年代一方面還沒有蒐集足夠的史料，當然說不上史料與理論相互驗證的工作；另一方面，因為當時馬克思主義席捲東亞（甚至全球），擁有極大權威，以致很少學者懷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以及其是否能夠適用於中國社會。而且，當時也沒有太多機會認識到其他西方的社會理論思想。因此，無論是臺灣的中國改造論戰與中國的中國

³² 有關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內涵與發展過程，參見任俊偉，〈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認識與思考〉，《理論學刊》2007：6=160，頁 84-87；李紅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來龍去脈〉，收於李紅岩，《中國近代史學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 49-86。

社會史論戰，都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詮釋之間的相互辯論，真正當代意義下的歷史研究還相當少。³³ 共產新中國建立後，將近三十年間半殖民地半封建論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理論，當時的學術環境並無超然於政治的獨立性，因此雖開始有一些紮實的史料收集與研究工作，但基本上這一理論並未受到挑戰。

然而，1980 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的革命史觀之言說效力窘態畢現，不再有其說服力。儘管為了避免危及自身的統治正當性，官方並未正式修改這一史觀，但民間的經濟史觀實際上已經大大改變，尤其國外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更是早已否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史觀的解釋力。事實上除了史學史與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者還會提到這些半殖民地半封建史觀的理論或研究之外，中國經濟史研究者除非研究回顧的需要，已很少人會提到這些理論觀點。他們發現開港以來的晚清，以及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時期的中國經濟，儘管有帝國主義剝削的一面，但也同時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逐步發展與正面效應。不僅少數的買辦與官僚資本家在帝國主義與國家的羽翼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有許多的中小資本家也都慢慢發展起來。此外，無論晚清、北洋與國民政府都很難說僅是西方帝國主義與外國資本家的附庸與工具，相反的他們的確透過其財稅與經濟政策促進了民族工業與民族資本家的發展。同時，這樣的經濟演變雖然從沿海開港區域發展起來，但只要時間許可，也在慢慢擴及廣大腹地的社會經濟發展。³⁴

事實上，從這些學者的研究看來，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採取的中國經濟發展政策——「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某個程度上是重新走上了之前中國共產黨半殖民地半封建論所反對的國民黨經濟改造的路線，即利用外資、外國技術以及關稅

³³ 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重要國民黨左派學者陶希聖，1934 年在《食貨》半月刊創刊號的〈編輯的話〉裡就說：「有些史料，非預先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不能認識，不能評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論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證實，不能精緻，甚至於不能產生。中國社會史的理論爭鬥，總算熱鬧過了。但是如果經過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局部歷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進一步的理論爭鬥，斷斷是不能出現的。」參見陶希聖，〈編輯的話〉，《食貨》創刊號（1934 年 12 月），頁 29。

³⁴ 比較重要的作品舉例，如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Loren Brandt,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1870-1937*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村上衛，《海の近代中国：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顧琳（Linda Grove）著，王玉茹、張璋、李進霞譯，《中國的經濟革命：二十世紀的鄉村工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吳松弟主編，《中國百年經濟拼圖：港口城市及其腹地與中國現代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奧村哲，《中国の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近現代史像の再構成》（東京：桜井書店，2004）。

自主等經濟與財稅政策，促進本土經濟與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依據這些新的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以及中國共產黨掌權後以至改革開放的實際歷史來看，臺灣與中國改造論爭中，右派陳逢源雖受到歷史唯物論的影響，仍採用了封建殘餘等說法，並忽略外國資本家對於中國經濟改造的許多正面影響，但他對於歷史的觀察以及預測其實是相對正確的，而非看起來較具批判性與道德制高點的許乃昌與蔡孝乾之半殖民地半封建史觀。

此處可以附帶提到的是，黃俊傑曾在其有關中國改造論爭的研究裡，主張：

如果我們將上述三位臺灣知識份子關於「中國改造論」的爭論意見，取而與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關於同樣問題的論點互作比較，我們就發現：臺灣知識份子思考中國之前途，基本上將中國當作某種「概念」，思考社會進化的各種階段在中國的適用性；但身處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思考中國前途時，則常將中國當作「實體」，因此，他們較能考慮中國發展的複雜性。³⁵

然而，這一說法是很有問題的。大多數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參與者，尤其是代表第三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新思潮派者（即半殖民地半封建論）者，方是將中國當作某種「概念」來思考，而未進行有關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正式研究。他並沒有注意到，其實陳逢源的觀點，與當時開始從事實證性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生命派，如陶希聖等人的觀點接近，較為符合歷史事實，即都注意到中國已經有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主張是不適合中國的。

接著，我們參照臺灣經濟史研究的成果，來看前述臺灣社會改造論爭中何者的觀點比較符合新的研究觀點，還是左、右兩派的論點都有些分析不準確之處。但討論之前，我們應該將開港以來的經濟史分成兩期，一個是開港到殖民之前，另一個是殖民初期到中期論戰時期。首先，我們注意到矢內原忠雄與東嘉生這兩位馬克思主義臺灣經濟史學者，皆認為英國等外國商業資本家進入臺灣之後，基本上控制了臺灣的貿易，導致臺灣原有商業勢力（郊商）的瓦解。近年來，陳映

³⁵ 黃俊傑，〈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以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改造論」的辯論為中心〉，收於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113。

真仍相信這些左派經濟史家的錯誤說法，而認為：「鴉片戰爭後臺灣也被迫開港，強迫貿易，洋行取代了傳統行郊，外國銀行資本全面控制了臺灣的經濟商品作物的生產與貿易過程，買辦資產階級興起，但一般地人數少，力量弱，沒有集居新興工商城市的厚實的資產階級」。³⁶

然而，實際上林滿紅、林玉茹與筆者的研究都顯示，開港後外國商業資本家初期因為掌控了國際商品的最終銷售渠道，而且透過西方銀行等金融資本的支持得以透過出口前貸金等方式控制出口品的買收，因此開港早期得以快速增加其在茶、糖、樟腦與煤等國際商品的貿易份額。然而，在這個過程中臺灣原有的郊商並未完全受到壓制而失去其勢力，他們透過傳統的家族與合股或其他金融工具也得以擁有一定的資本從事商品買賣，同時他們透過本地情況資訊認識的優勢，也能與外國資本家進行一定的商業競爭。結果開港後期，本土商業資本家不但在茶與糖的出口貿易份額上有所回升，而且整體的貿易數量也是增加的。更重要的，這些傳統的漢人郊商也透過與外國資本家的合作，學習到新的國際貿易知識與技巧，為其資本積累與產業擴展奠定更多的實力。³⁷

接著，有關殖民初期到中期的殖民經濟史，實際上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的說法也已經被近來的臺灣經濟史研究成果所否定了。首先，矢內原忠雄在其 1929 年的作品裡，運用馬克思與列寧的經濟理論來分析臺灣的糖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注意到在殖民政府的政策協助下，臺灣的蔗糖產業資本主義化演變有兩個層面的發展，一方面蔗糖生產的方式越來越資本主義化，原有傳統的舊式糖廨陸續為日本資本家的大規模新式製糖廠所取代。另一方面，也看到糖廠為了有效掌控蔗糖原料的生產成本，因此努力兼併土地，發展大規模的栽植農場，僱用農業勞工來

³⁶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臺灣經濟史概說》，頁 211-271；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35-38；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頁 145。但有意思的是陳逢源 1945 年為上述東嘉生一書寫的書評，已經注意到東嘉生誇大了外國資本家對於本土資本家與郊商勢力的驅逐（參見以下討論）。參見陳逢源，〈書評：東嘉生著「臺灣經濟史研究在讀七」〉，《民俗臺灣》5: 1=43（1945 年 1 月），頁 45-46。

³⁷ 林滿紅，〈清末大陸來臺郊商的興衰：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4: 2（1994 年 7 月），頁 173-193；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 2（2010 年 6 月），頁 1-37；林文凱，〈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頁 215-252；李佩蓁，〈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20: 2（2013 年 6 月），頁 31-76。

耕作蔗田，藉以提高生產原料的自給率。換言之，矢內原認為原有的封建土地生產關係（地主與佃農）會日漸為農業資本家與農業勞工的資本僱傭關係所取代，而傳統的家戶式小農生產，則日漸被資本家的大規模栽植農場發展所取代。他並相信正在蔗糖業產生的這種壟斷資本主義化演變，也會在稻米生產這個產業上發生。

對於矢內原忠雄來說，雖然運用馬克思與列寧的理論，但他的觀點並非前述的殖民地半封建論那樣強調封建的土地生產關係將持續存在，而是比較像連溫卿的山川派那樣強調日治中期臺灣社會已經高度資本主義化，相信壟斷性的日本資本家將會促成臺灣社會各個產業部門的高度資本主義化，以及傳統封建生產方式的完全瓦解。³⁸ 然而，儘管矢內原忠雄一書關於製糖產業的壟斷資本主義化部分是正確的，但是他對於甘蔗種植與稻米種植等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終將瓦解的說法卻是錯誤的，因為實際上傳統的地主、佃農關係以及家戶式的小農生產方式一直都是頑固地存在著。

涂照彥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中，認為矢內原忠雄在分析臺灣的資本主義化時，忽略了臺灣本地社會的傳統經濟社會結構——以地主制為基礎的本地資本的存在。他強調：

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經濟結構，基本上是由一方面是受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所制約的、以日本資本家企業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化」，另一方面則是深受其影響，但又繼續留存下來的臺灣本地資本（地主制）為中心的傳統社會。因此，如欲描繪臺灣經濟的全貌，就必須是兩項兼顧，既不能僅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而產生外在壓力的一面來看臺灣經濟，也還要從臺灣經濟內部來掌握殖民地化這樣一個內容必不可少的觀點。³⁹

涂照彥的研究結論為：

臺灣經濟之被殖民地化，是經過日本資本的侵入、統治與臺灣本地資本的抵抗、到弱體化為內容的對抗關係而實現。⁴⁰

³⁸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94-298、316-317。

³⁹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 11。

⁴⁰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11、13。

涂照彥的分析比起矢內原忠雄，更進一步的從兩個面向否定了許乃昌等人的經濟史觀點，一是儘管他不無矛盾地使用封建概念來形容本地地主與資產家，似乎認為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地租關係不是一種純粹契約關係，而是仍帶有封建性質的關係。但是他清楚地注意到臺灣從清代初期就已經與對岸之間有著發達的貿易關係，因此臺灣的商品經濟原來就已經很發達，並非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型態。二是，他強調臺灣的本地資本不但存在著，且非如過去所說的那樣完全受制於日本資本家，而是經歷了一種抵抗、從屬化到弱體化的演變關係。

儘管涂照彥強調了本地資本的對應與變化，但他的整個論述基調，仍然是強調日本壟斷資本的難以對抗，以及殖民統治使整個臺灣農村陷入貧困化狀態。然而，二十餘年後，另一位左派經濟史學者柯志明在《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⁴¹一書中，則對日本資本主義對於本地資本的宰制，以及對於農家經濟的剝削能力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把臺灣的經濟分成兩個階段，首先是1920年代以前糖業資本主義為主的時期，當時日本糖業資本家透過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的政策協助（財稅、農業改良）一方面大力提升甘蔗製糖生產力，另一方面則透過甘蔗採集區等制度有效壓低甘蔗原料的收購成本，從而促成糖業資本家的巨額經營利潤，而在這個製糖產業蓬勃發展的時期，臺灣的農民並無法大量分享這些產業利潤。

其次，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晚期戰時計畫經濟時期為止，臺灣的新品種米，即蓬萊米開始大量輸出到日本，由於一般小米商無法過度壓低米收購價，而一般地主也無法過度提高佃租，因此隨著蓬萊米輸日的發展，臺灣農家（包括佃農）也都得以分享這些經濟收益，並且因此得以購買土地，提升自耕的比率。與此同時，由於蔗糖業在收購甘蔗原料時，為免收購價格過低導致蔗農轉作其他作物，因此單位面積水田收益的提高，也間接導致了蔗農收益的提高。這就是所謂的米糖相剋現象，導致臺灣的日本糖業資本家的剩餘價值積累之危機。日本糖業資本家雖然配合總督府經由各種政策試圖解決這一危機，但因為臺米輸出受到日本米出口商、本地地主資本與土壟間、日本工業資本家（希望藉以降低日本米價、以降低勞動成本）以及本地農民的支持，因此總督府直到1930年代晚期、戰時

⁴¹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

計畫經濟的時期，才得以採取政策壟斷臺米輸出的收益，以解決米糖相剋問題。

柯志明的研究顯示，即使同樣是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概念（但柯志明完全不使用「封建」這一概念），但實際用來分析日治時代臺灣經濟史的時候，其結果與許乃昌、臺共、矢內原忠雄以及涂照彥等人的分析都不相同。⁴² 日治初到中期為止，日本製糖業與甘蔗生產力都有驚人的成長，但糖業資本家配合總督府的力量一直得以有效維持其剩餘價值積累體制，因此臺灣種甘蔗的農民無法一起分享取得的經濟收益，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低度發展的發展」，也就是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經濟從屬階段。但 1920 年代開始蓬萊米輸日以後，米糖相剋現象的出現，以及米作部門階級支配模式不像糖業部門那般嚴密的情況下，導致了日本資本積累體制的破綻，並使得臺灣本地地主與農民經歷了「平衡而均惠式的發展」，這可說是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階段。⁴³

⁴² 不過，柯志明的分析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他認為：「臺灣農業納入市場生產的過程當然不是始自殖民時代，早在十九世紀末期就已經明顯可見。但農業生產真正大規模有系統向商品的生產及交換轉變的過程則是在日治時代才發生。……商品生產對農民而言，已經不再是額外附帶的生產，農民事實上已無法在市場生產與自給自足式的維生生產兩者間自由進出。因為，農民甚至連自己生存所需也必須仰賴市場。因此，我們要繼續追問的問題毋寧是：『日治時代臺灣農村從傳統自給自足式的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農民的家戶生產方式何以能繼續存在？殖民政府與外來資本對這個轉型過程以及家庭農場的存續又扮演了什麼角色？』」這種說法把臺灣農業商品化的時期訂得太晚了，其實清初開始，臺灣主要的米作與蔗作就是市場經濟的作物，農家必須在市場上銷售以便取得貨幣購買維生所需商品。事實上柯志明自己計算的統計表顯示，臺灣的稻米銷售率從日治初期就已經有百分之五十左右了。參見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頁 81，以及頁 60「表 1.9 米的銷售率，1905-193」。

⁴³ 此外，晚近臺灣社會經濟史的其他研究者如洪詩鴻、高淑媛、堀內義隆等人的研究，則顯示在日治時期臺灣本地的中小商業與工業資本家其實並未在經濟演變中缺席，而是經歷了同樣的成長與發展。參見洪詩鴻，〈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と商人資本：日本植民地期を中心として〉，《經濟論叢》154: 3 (1994 年 9 月)，頁 42-62；洪詩鴻，〈日本植民地期の台湾人産業資本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小零細資本の成長を中心に〉，《經濟論叢》155: 2 (1995 年 2 月)，頁 59-79；高淑媛，〈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罐頭業為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堀內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の米穀産業と工業化：糊摺・精米業の發展を中心に〉，《社会経済史学》67: 1 (2001 年 5 月)，頁 23-46；堀內義隆，〈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中小零細工業の發展〉，《調査と研究》30 (2005 年 4 月)，頁 23-44；堀內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台湾人小経営：工業化の周辺〉，《地域総合研究》33: 1 (2005 年 9 月)，頁 83-96；堀內義隆，〈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工業の形成：製帽業を事例として〉，《日本史研究》556 (2008 年 12 月)，頁 26-53；堀內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機械市場の形成と機械工業の發展〉，《現代台湾研究》35 (2009 年 3 月)，頁 36-56；堀內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農村工業の発達と労働供給〉，《三重大学法経論叢》27: 2 (2010 年 3 月)，頁 45-62。

總之，左、右派學者引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臺灣的社會經濟史認識，的確提供了概念與分析架構上的重要啟發與認識。然而，如果我們逕自相信這些理論觀點，而沒有將這些理論概念放在實際的歷史脈絡下加以檢驗、修正的話，我們將犯了把歷史想像當作歷史現實的謬誤，也無法提出適切的社會改革方案。

四、戰後以來西方與日本社會主義實踐與思想史的轉變

二次大戰結束、冷戰結構形成以來，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史都慢慢有了極大的轉變。在共產陣營方面，蘇聯與其所屬的東歐陣營推動激烈的共產革命，但在 1950 年代的匈牙利革命與 1960 年代的布拉格之春等事件後，蘇聯共產黨與其社會主義實踐的專制性與反民主，不僅導致社會主義在共產陣營內號召力的降低，更使得其在西方民主世界的號召力大為降低；1980 年代晚期蘇聯與東歐的民主化與資本主義化，則導致社會主義實踐與思想的最大挫敗。而在中共部分，1949 年內戰中擊敗國民黨取得政權以後，毛澤東掌權下的中共持續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在數年後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更於 1960 年代發動文化大革命，引起世界上左派社會革命者的熱情與讚頌；1970 年代晚期鄧小平重新掌權以後，中共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與此同時文化大革命真相陸續為世界所知，這導致中國共產黨與其社會主義實踐的號召力消失。

而在西方與日本的民主國家陣營，1919 年第三國際成立後，走社會改良路線而遭排擠的社會民主主義重新振作，摒棄軍國主義、極權主義與暴力革命，主張透過普選的民主程序推動漸進式的社會改革。這派社會主義雖然肯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主張透過合法程序與民主政治以推動社會主義理想。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戰後發展，這派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陸續取得政權，並推動了社會福利體制，在保持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體制的同時，透過各種福利體制重新分配經濟剩餘，以提供勞工、殘障、老年與其他社會弱勢者足夠的福利保障，藉以打造相對公平、正義與平等的社會。隨著中國與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西方社會民主政黨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生產體制只能導致經濟災難，因此放棄廢除資本主義生產的過時理想，改以社會福利體

制的建立來達成社會主義的分配正義理想。⁴⁴ 但 1980 年代以來社會福利體制造成的國家財政負擔過高，以及資本主義經營效率的下降，造就了新自由主義（主張進一步的經濟自由化，以及社會福利的市場化與削減）主張的出現，正對以社會福利主義為主軸的既有社會民主主義運作帶來威脅。不過，並沒有哪個社會主義政黨認為可能走回頭路、以傳統第三國際的方式，來應對這一新的社會主義危機。⁴⁵

伴隨社會主義政治運動的轉變，世界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也面臨全面變革，尤其 1960 年代晚期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或者說新馬克思主義）興起。西方馬克思主義嚴厲批判了第三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與階級鬥爭詮釋：首先，有關下層結構（經濟，也就是階級關係）與上層結構（政治、宗教與文化等）的關係：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依照馬克思的名言：「是社會存在決定意識，而非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主張經濟結構決定了政治、宗教與文化的結構。然而，戰後的馬克思主義者依照馬克思的早期作品，或參考了其他西方社會理論家如韋伯（M. Weber）等人的觀點，強調下層結構和上層結構乃是「交互影響」，而且上層結構有其「相對自主性」。

其次，國家與階級關係之間的關聯：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國家是階級關係的反映，基本上只是該社會統治階級的階級壓迫工具。而且依據這個理論，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所成立的人民專政國家，代表的則是所有無產階級。因此無論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機關本身都無其自主性。然而，戰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發現馬克思這一觀點是錯誤的，一方面，不僅戰前戰後的資本主義政府都顯示其相對於資產階級（統治階級）之相對自主性，因而可能

⁴⁴ 有關社會主義運動在二戰之前的歷史，參見 G. D. H. Cole,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Carl Landauer, *European Socialism: A History of Ideas and Movement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Hitler's Seizure of Pow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6); Geoff Eley,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二戰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史，參見 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2010); 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Ecco, 2009); 和田春樹，〈歷史としての社会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92）。有關日本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歷史，參見岡田一郎，〈日本社会党：その組織と衰亡の歴史〉（東京：新時代社，2005）。

⁴⁵ 有關社會福利主義與其面臨的危機，參見 Gø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Gøsta Esping-Andersen,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6)。

為了社會的整體運作而加以壓制資產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蘇聯與中國等共產國家在成立以後，政府官僚本身也顯現出其自主性，為了自身權力的維持而行使其權力，而非如馬克思原先期待的全心為無產階級謀求福利之無產階級專政工具。

其三，馬克思曾預測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生產關係將會兩極分化成資本家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類屬，而無產階級將會從自存（in itself）的階級，透過階級意識的建構而變成自為（for itself）的階級，並因而集結起來，在無產階級政黨的引導下發動社會革命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然而兩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實驗顯示，這套歷史唯物論的分析與預測無論在已開發和未開發國家都不成立。在西方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社會分化的情況不是兩極分化，而是由無數的中間階級發展出來，而且各種的勞動階級也並未建立集體的無產意識連帶，因此社會革命並未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歐美與日本等國家發生。且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引導下，他們接受了資本主義的存在而追求社會福利體制的修正。另一方面，未開發或開發中的第三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相當有限，卻反而以違背馬克思主義預測的方式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以至於其發生本身不代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反而是矛盾的展現。而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也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失敗。⁴⁶

必須強調的是，第三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失敗，並非代表社會主義政治理想的全盤失效，事實上歐美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功，代表了提供烏托邦想像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有效修正，並顯現了目前所能想像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最佳樣態，儘管近年來它也面對新自由主義等右派全球化的挑戰危機。⁴⁷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與相關預測的嚴重錯誤，並非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失去其在社會科學上的解釋力，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不但在戰後到 1960 年代期間成為最重要的社會科學理論，並且在其後仍持續刺激了種種後殖民主義

⁴⁶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於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相關批判，參見以下西方左派學者的解析，C. Wright Mills 著、商務印書館譯，《馬克思主義者》（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第六章，頁 108-137；Perry Anderson（安德森）著，高銛、文貫中、魏章玲譯，《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Perry Anderson 著、余文烈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Perry Anderson、Patrick Camiller 主編，張亮、吳勇立譯，《西方左派圖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Leszek Kolakowski (Author), P. S. Falla (Trans.),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⁴⁷ 近年來，西方社會民主主義面對的挑戰與可能回應，參見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著、鄭戈譯、黃平校，《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與後現代主義等派生社會理論的出現。儘管馬克思主義在許多議題與領域都被其它社會理論所挑戰或取代，但譬如階級支配分析等概念在政治經濟學等廣泛分析議題上，或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文化社會學議題的研究上，都仍然是許多重要解釋框架的必要成分。⁴⁸

那麼以上這些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的發展，對於我們討論 1920-1930 年代的中國與臺灣社會改造論爭有何意義呢？左派學者陳芳明在其研究結論裡，曾經提到：「這場論戰並未得到具體的答案，因為歷史沒有提供餘裕空間讓左右兩派運動者得到充分的發展。史實已經顯示，左翼路線在一九三一年就遭到中止，右翼路線則延續到一九三六年因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解散而停頓下來。階級運動者憧憬的臺灣革命，終於沒有發生，民族運動者期盼的臺灣議會，最後也未實現。」⁴⁹ 另兩位仍堅持第三國際左派革命目標的學者陳映真與邱士杰，則沒有注意到許乃昌等人依照第三國際革命史觀在歷史分析以及實踐目標上的問題性。⁵⁰ 而是持續肯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的歷史解釋正確性，同時似乎遺憾許乃昌等人期待的臺灣階級革命之未能（與中國共產革命一起）完成。⁵¹

以上幾位研究者在分析這場論爭的左、右派人士的思想時，似乎也把自己固著在 1920-1930 年代的時空中，而忘記馬克思等社會主義者「科學社會主義」所要求的，依照「後見之明」來理解歷史事件的意義，以便提出更為適切的社會實踐目標與策略。⁵² 事實上，雖然殖民政府的鎮壓，使得臺灣左派與右派運動者的

⁴⁸ Andrew Gamble, David Marsh, and Tony Tant, eds.,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99); Crystal Bartolovich and Neil Lazarus, eds., *Marxism, Modernity,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⁴⁹ 陳芳明，〈「中國改造論」：論戰與 20 年代臺灣左翼思想的傳播〉，頁 200-201。

⁵⁰ 不過，這其中連溫卿與許乃昌等並不相同，他不採臺共的第三國際暴力革命路線，也非採（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的理論觀點，而是比較傾向於戰前日本山川均—勞農派的合法左派無產階級政黨的路線。但這時山川勞農派的合法改良主義與二十世紀後期的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立場並不相同，前者仍持有以平和革命廢除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但承繼戰前山川勞農派的日本社會黨，在 1986 年發布「日本社會黨的新宣言」，放棄廢除資本主義的政治目標，即全面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化。

⁵¹ 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頁 138-160；邱士杰，〈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頁 69-140。1980 年代中國共產黨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在官方正統說法上持續堅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左派史觀，但實質上走的是其以前否定的國民黨的實踐路線。因此令人疑惑的是，陳映真等左統學者似乎對此轉變視而不見，不知為何還能堅持中共的革命史觀，並認為其半殖民地半封建論的革命史觀是正確的。

⁵² 十九世紀晚期馬克思在批判之前的社會主義思想時，稱他們是空想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而

理念都沒有實踐的機會，但戰後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與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功經驗就像是這些相關理念的替代性實驗，提醒我們論爭當中陳逢源等右派的經驗分析是比較合於歷史發展，其實踐目標比較接近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是較有實踐成功可能的。實際上，戰後臺灣歷史發展的成功路徑，走的其實也是這樣的道路——前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後期透過民主化過程模仿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建立社會福利體制。⁵³

儘管如此，許乃昌與臺共等的左派主張並非因此完全失去其歷史價值，這些激進的主張儘管錯誤分析了歷史的進程，或提出了既有人性基礎下缺乏實踐可能的社會主義理想，如果成功了也可能是帶來經濟與政治災難；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時空裡，這些主張的確提供臺灣民眾現代性認識的重要來源，對於臺灣社會的整體知識啟蒙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在殖民政治與文化壓制下，這些左派理念對於臺灣人的反殖民與民主意識的啟蒙，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我們也可以想像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只有右派政黨與思想的存在，而沒有左派政黨與意識的存在和挑戰，那麼資本主義的改良與追求分配政治的社會福利體制也不太有實現的可能。

然而另一方面，如同上一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諸多概念框架對於中國與臺灣近代歷史研究雖然提供了重要了啟發，但應用其進行經驗性的歷史研究時，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勉強套用的陷阱中。很多學者一開始就認為馬克思（列寧）理論不可能會錯，認為取自西方社會史的分析架構——五個社會歷史階段論，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發展路徑，或者無產階級革命不但具有歷史必然性，而且帶著道德正當性。又或當推動蘇聯共產革命成功的第三國際，其為東亞共產革命所設定的革命綱領也必然具有經驗認識與社會實踐的權威性。無論從學術相對於政治與道德主張的自主性，以及學術研究的本土化，或是東亞社會的後殖民主體史觀來說，這種對待馬克思主義或第三國際的態度實際上很有問題，該種態度實際上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意識形態化效果，而破壞了其原先具有的啟蒙效果。

把自己經由科學性的社會歷史研究所確立的社會主義，稱為科學社會主義。

⁵³ 林萬億，《臺灣的社會福利：歷史與制度的分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第 2 版）。

西元 2000 年，臺灣著名作家與文學史家陳映真與文學史家陳芳明之間發生激烈的文學史觀論爭。先是陳芳明在建構臺灣新文學史時，主張：「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而應該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個歷史階段與其所處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他依照政治為中心的演變，將日治以來的臺灣史分成三個時期：殖民時期（1895-1945）、再殖民時期（1945-1987）與後殖民時期（1987 迄今），依其定位，殖民之前的清代則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封建時期。⁵⁴ 陳映真則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嚴厲批判陳芳明的社會歷史分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性質論，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史觀，將臺灣的社會性質分成以下幾個階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晚清開港以來）、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日治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戰後前五年至土地改革為止）、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或後來的新殖民地-波拿巴國家-脆弱資產階級）（1950-1980 年代中期）、新殖民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1980 年代中期-2000 年）。⁵⁵

兩人史觀的差異不僅在於陳芳明著眼政治支配面，而陳映真則服膺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還與兩人的民族主義立場（陳芳明左獨、陳映真左統）之差異有關，這個部分因與本文主軸無關，我們不在此討論；同時，本文也不討論戰後以來臺灣歷史分期的問題。⁵⁶ 這裡我們關切的是，兩人有關清代與日治時期的社會經濟史認識是否適切的問題。嚴格來說，兩人都是使用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史觀來看待清代與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史，譬如兩人都基本承認清代臺灣是封建社會，以及日治時代是殖民與半封建的社會狀態。但是兩人觀點的差異在於陳芳明在強調殖民統治者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壓迫時，願意承認殖民統治所帶來的「資本

⁵⁴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上冊，頁 23-42。

⁵⁵ 關於晚清的臺灣史，陳映真參考了左派經濟史學者戴國輝的看法；至於戰後以來的臺灣歷史演變，陳映真主要參考了以左派依賴理論為典範的劉進慶之看法。參見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頁 138-160；邱士杰，〈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頁 241-299；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75）；戴國輝，〈研究臺灣史的經驗談(1)-(5)、(完)〉，「夏潮聯合會」，下載日期：2014 年 6 月 23 日，網址：http://chinatide.net/xiachao/content_95.htm。

⁵⁶ 嚴格來說，現在臺灣社會經濟史學界很少有人採用劉進慶、陳映真等人這種純粹左派依賴理論的觀點來定位臺灣戰後經濟史。這些看法不願意面對臺灣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的正面事實，而僅關切百年來在經濟演變過程中「殖民地性格與半封建性格」持續不變的負面表徵。比較值得重視的是另一位原也受依賴理論深刻影響的臺灣經濟史家涂照彥，他在 1980 年代以來修正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改採取國際經濟理論觀點，考察包括臺灣在內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三角成長」模式。

主義與現代化」；同時他的文學史觀不再是僅重視階級主體的馬克思主義史觀，而是重視多元主體的後殖民主觀。而陳映真則堅持否定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曾為臺灣帶來「資本主義化與現代化」。

在批評陳芳明的社會經濟史觀之前，我們必須肯定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理論之關係其實已有許多反省，因此他對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作出的許多反批判也是中肯的。陳芳明正確指出：一、陳映真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唯一的科學知識，然後以這樣的知識作為面具來巧妙掩飾他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二、他並未針對臺灣文學史料做過充分研究，因此相關討論流於印象式與跳躍式。三、陳映真在討論到臺灣歷史時就強調存在（經濟）決定意識的唯物論，而在討論到中國與臺灣的關係時，則無意中變成以意識決定存在的唯心論。四、他也忽略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否定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的經濟與文化的單面向關係，並強調文化的複雜性和相對自主性。⁵⁷

但就社會經濟史的層面來說，根據上一節有關臺灣經濟史的分析，陳映真與陳芳明兩人同時使用的封建社會論、殖民地半封建論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史概念，就現在的歷史認識來說已經有修正的必要。陳芳明的臺灣文學史研究堅持反殖民的後殖民立場，但同時避免僵化、教條式的後殖民立場，強調「臺灣經驗在全球的殖民史中所具備的特殊性與差異性，絕對不能以第三世界的普遍經驗來概況」。⁵⁸ 可惜他並未將這種堅持本土歷史主體性的後殖民史觀，應用於作為文學史與文化史研究基礎的社會經濟史之重新認識上，他對於臺灣經濟史的認識，一直停留在 1980 年代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點，而未反省到這種經濟史觀在解釋臺灣經濟史時有著「去臺灣主體性」問題。因此陳芳明儘管肯定殖民統治帶來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但他基本上認為這是殖民者帶來的，而非被殖民者自身的參與、抵抗與協同等多重複雜回應的結果，這與他在討論臺灣文學時的多重主體回應觀點，形成強烈的對比。

陳芳明在討論臺灣文學史時，曾引用臺灣文學研究者張誦聖《現代主義與本土抵抗》一書的觀點，來批判陳映真對於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錯誤批判。陳芳明認為：

⁵⁷ 陳芳明，〈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收於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第二版），頁 243-260。

⁵⁸ 陳芳明，〈自序：我的後殖民立場〉，收於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9-20。

從歷史事實觀察，現代主義之介紹到臺灣，乃是島上殖民者與西方殖民者相互勾結之後的結果。因此，主張現代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帝國主義文化的延伸，其實是無需爭辯的。然而，要建構文學史，並不能讓歷史停格於臺灣受到文化侵略的階段。臺灣作家在最初接受現代主義的影響之後，便開始對現代主義進行改造與擴充，使其本土化、在地化。⁵⁹

其實同樣的看法，也可以用來觀察殖民者把工業資本主義引入臺灣以後，臺灣的經濟主體（本土資本階級、農民與勞動者等）的回應方式。過去馬克思主義者為了訴諸革命主張的正確性，把臺灣的經濟主體看作傳統的封建主體，認為他們缺乏資本與能力抵抗西方與日本資本主義的新體制，只能淪為這個體制中被動的受剝削者。卻忽略了這些經濟主體絕不封建，他們其實早已熟悉商業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更有不少人擁有雄厚的資本與學習能力，參與新體制的運作。因此儘管不少人在這個新體制下承受嚴重的剝削，但他們事實上也可能如上述的文學作家一樣，發揮自己的主體性，透過抵抗、順應、協同與改造等多重方式，推動資本主義在臺灣的本土化與在地化。因此工業資本主義的確是有外來引入的部分，但其帶來的影響，則必須根據本地既有條件以及其回應過程才能確定，而這必須從經驗研究中才能確認，無法單憑某一理論觀點就預先決定。

陳芳明曾批評陳映真將馬克思過度神聖化，沒有注意到馬克思對於印度殖民歷史的解釋有著為西方殖民主義辯護的意涵，含有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馬克思主義因此某個程度上是「殖民主義的變相延伸」。⁶⁰ 可惜的是，陳芳明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封建社會論與半殖民地半封建論並不能充分解釋中國與臺灣的社會經濟史（因此也不能如他認為的有效支撐其臺灣文學史的許多解釋觀點）。到目前為止，陳芳明基本上還是贊同馬克思的想法，認為直到晚清的中國與臺灣都是封建生產關係為主的社會；而且西方是從四百年前就已經成為全球霸權，開始其殖民的事業。臺灣的現代性是在日治初期展開的，是一種壓縮的現代

⁵⁹ 陳芳明，〈當臺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收於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280-281。

⁶⁰ 陳芳明，〈有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三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收於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288-296。

性，即西方發展四百年的現代性在二十年內移植到臺灣。⁶¹ 這些看法與當代的世界史和東亞經濟史看法有著很大的差距，也忽略了臺灣得以快速現代化的本土歷史基礎（參見上一節的相關討論）。

總之，日治中期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引入臺灣社會，本身就是臺灣社會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下，追求對於自身現代性認識的一種啟蒙事業。但評估其在當代社會的歷史意義時，研究者不能僅將自身固著於那個特定的歷史時空，而必須注意到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在戰後的東亞、以至於西方世界的演變，否則我們無法充分認識臺灣社會是怎麼從過去走到那個時間點，又如何從那個時間點走到當代社會的。

五、結論

西方社會科學在討論西方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時，往往著眼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民主政治的建立與民族主義意識建構這三個重要面向。臺灣在 1920-1930 年代社會史論爭期間的種種歷史言說，如上所述實際上就是圍繞在以上三個重要面向的不同思想考察，以及為達成這些重要發展所提出的不同實踐策略。當時臺灣的左、右派知識分子，透過其言說訴說著他們各自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民主政治以及民族主義意識的看法與認識。同時，這些考察不但提供當時的閱聽大眾，政治、經濟、文化等新的社會科學概念，同時啟蒙其認識到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社會現象相互之間的緊密關聯。就此說來，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歷史言說儘管粗糙，卻是臺灣社會追求自我認識的第一波現代性啟蒙，同時也是近代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以及文學（史）的第一波知識移植工程。可見這一個社會史論爭在臺灣史上的重要性。

過去針對這一論爭的既有研究，著重於臺灣政治思想史與文學史面向的討論，對於其如何影響臺灣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政治與文化民族主義層面的討論尤為詳細，同時對於這一論戰與臺灣左派思想的傳播或相關文化思想的影響，也有很豐富的討論。然而，本文也注意到既有研究卻常忽略了與該論爭密切相關的社

⁶¹ 陳芳明，〈有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三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頁 296-303。

會經濟史議題，同時也沒有關注二次大戰以來國際社會有關社會主義的思想與運動的轉變。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嘗試把經濟史的討論納入討論中，希望提醒臺灣政治思想史與文學史研究者注意到近年來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與相關議題的關聯；另一方面，也希望把臺灣的這波左、右派論爭納入更廣泛的世界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的演變中加以考察。

事實上筆者以為歷史研究難以避免具有當代史的意義。因為進行寫作言說的我們本身是當代的人，不僅無法完全迴避當代的價值觀，且必然依據這些價值觀而決定那些問題值得研究，並探究其意義；同時，歷史寫作的基本意義也是為了透過說明那一段歷史，而直接或間接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的社會。另一方面，歷史也很難避免或者不應避免後見之明，因為不論歷史是延續或者斷裂，它總是發生在當代之前的現象，與當代事物之間總有某些關係存在，所以我們有必要把後來歷史演變的知識納入對於過去歷史的詮釋之中。⁶²

雖然歷史有時對想要探討過去的人來說顯得殘酷，因為真相可能消融在遍尋不著的時空隙縫裡，已經追索不到是怎麼發生與流變的了。然而，歷史也可能對當時的人展現其冷酷，因為當事人當時可能只看得清周圍的事情（沒有精確統計數字），也可能只能掌握有限的工具（馬克思主義概念），眼光因而受到遮蔽而看不到真相。或有時事件還在發展過程中，必須等到一段時間之後，事情才有比較清晰的圖像。以本文研究的臺灣社會史論爭來說，無論就史料還有觀察工具，1990年代以來的臺灣史學界總算有了比較完備的機會去評估那一個歷史事件，因此我們發現封建論與半殖民地半封建論這些概念框架，其實並不合於歷史的真實，而是我們的前輩們在那個時空中受限於史料與認識工具所能得出的不真實想像。

進一步來說，歷史之流並未被截斷在日本殖民統治中期的那個短暫時空，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思想仍然持續流淌過冷戰時期以至於現代，這些運動與思想也在不同的地理空間被以不同方式實驗著，有的失敗了，有的改良則成功了，儘管可能也面臨著危機。因此，當代的我們思考這一社會史論爭的意義時，有必要參照戰後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流變來重新考察其意義，看看歷史的後見

⁶² 有關歷史研究與個人當代價值觀的關聯，參見 Max Weber 著、李秋零譯，《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第一篇，〈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頁 1-42；第三篇，〈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頁 92-124。

之明所能帶給我們的不同評價與認識。就此來說，也許有些人仍然不願承認第三國際暴力革命實驗之失敗，以及社會民主改良主義之相對成功，而從信念倫理的角度堅持更具理想性的第三國際之革命綱領與史觀是正確的。

但對筆者來說，目睹這麼多東亞社會主義革命的真實結果，我們應該承認擁有類似史觀與實踐綱領的臺灣共產黨當時若革命成功，不但無法帶來經濟上的成功，也不能帶來民主的政治文化，反而可能帶來社會的整體倒退。因此透過「反事實的歷史實驗」方式來評斷臺灣社會史論爭時，⁶³ 我們將會注意到當時較具有理想性的左派想法，不但未能有效描繪出日治時期臺灣的資本主義演變，而且其所提出的社會革命策略也缺乏成功的社會條件。與此相較，右派如陳逢源等人提出的經濟史考察其實較接近真實，同時其社會實踐主張：「追求資本主義的成功，然後再進行社會問題的改良」，或許帶有維護自身階級利益的現實考量，因而不那麼具有理想主義，但卻是比較具有實踐成功可能性的。

⁶³ 反事實的歷史實驗是韋伯所提出的歷史學研究方法，他強調歷史儘管無法實驗，也無法進行計量統計，但我們透過比較某些相近事件的反事實結果之比較，從而對另一事件的歷史意義作出客觀且合理的詮釋。韋伯舉的例子是，如果我們想要研究西元前 490 年希臘、波斯之間的馬拉松戰役希臘戰勝之意義，可以用其他同時期波斯人在耶路撒冷、埃及與小亞細亞等地戰勝的結果來對照比較，透過這種反事實的比較，將可發現希臘在這場戰爭的勝利對於希臘與西方文明的後來發展，帶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參見 Max Weber 著、李秋零譯，《社會科學方法論》，第二篇，〈文化科學邏輯領域的批判研究〉，頁 43-91。

引用書目

《臺灣民報》

〈Cold War〉,「Wikipedia」,下載日期:2013年9月15日,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
戴國輝,〈研究臺灣史的經驗談(1)-(5)·(完)〉,「夏潮聯合會」,下載日期:2014年6月23日,網址:http://chinatide.net/xiachao/content_95.htm。

Anderson, Perry 安德森(著)、余文烈(譯)

1989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

Anderson, Perry 安德森(著),高銛、文貫中、魏章玲(譯)

1990 《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Anderson, Perry、Patrick Camiller(主編),張亮、吳勇立(譯)

2002 《西方左派圖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Dirlik, Arif 德里克(著)、翁賀凱(譯)

2005 《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Giddens, Anthony 紀登斯(著)、鄭戈(譯)、黃平(校)

2000 《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Mills, C. Wright(著)、商務印書館(譯)

1965 《馬克思主義者》。北京:商務印書館。

Pomeranz, Kenneth 彭慕蘭(著)、史建云(譯)

2003 《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Weber, Max(著)、李秋零(譯)

1999 《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小林文男

1970 〈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な思考:「中国改造論争」の意味と周辺(1)〉,《アジア経済》11(9): 40-51。

1971 〈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な思考:「中国改造論争」の意味と周辺(2)〉,《アジア経済》12(2): 14-30。

方孝謙

2000 〈一九二〇年代殖民地臺灣的民族認同政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0: 1-46。

台湾總督府警務局(編)、戴國輝(解題)

1986 《台湾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湾社会運動史》。東京:綠蔭書房。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

1999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仲偉民

2003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學術界》2003(4)=101: 223-240。

任俊偉

- 2007 〈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認識與思考〉，《理論學刊》2007(6)=160: 84-87。

吳松弟（主編）

- 2006 《中國百年經濟拼圖：港口城市及其腹地與中國現代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吳叡人

- 2001 〈「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 43-110。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 2006 〈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2): 127-218。
- 2008 〈誰是「臺灣民族」？：連溫卿與臺共的臺灣解放論與臺灣民族形成論之比較〉，收於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頁 199-229。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李佩蓁

- 2013 〈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20(2): 31-76。

李紅岩

- 2011 〈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來龍去脈〉，收於李紅岩，《中國近代史學史論》，頁 49-8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村上衛

- 2013 《海の近代中国：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和田春樹

- 1992 《歴史としての社会主義》。東京：岩波書店。

岡田一郎

- 2005 《日本社会党：その組織と衰亡の歴史》。東京：新時代社。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

- 2000 《臺灣經濟史概說》。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林文凱

- 2011 〈再論晚清臺灣開港後的米穀輸出問題〉，《新史學》22(2): 215-252。
- 2011 〈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創設與流失：以竹塹社為個案的歷史分析〉，收於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頁 133-183。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12 〈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的米穀輸出問題〉，收於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99-133。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13 〈清代中國與近代早期英國（16-18 世紀）經濟發展的比較：以土地所有權體制為焦點的分析〉，發表於河南大學法學院主辦，「中英比較視野下的國家、法律與經濟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2013 年 7 月 24-25 日。

林玉茹

- 2010 〈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2): 1-37。

林萬億

2012 《臺灣的社會福利：歷史與制度的分析》。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第2版。

林滿紅

1994 〈清末大陸來臺郊商的興衰：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4(2): 173-193。

邱士杰

2007 〈從〈黎明期的臺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史釋》35: 69-140。

2009 〈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收於文訊雜誌社編，《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41-299。臺北：文訊雜誌社。

2009 《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

1992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

施添福

2001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柯志明

2001 《番頭家：清代臺灣的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03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洪詩鴻

1994 〈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と商人資本：日本植民地期を中心として〉，《經濟論叢》154(3): 42-62。

1995 〈日本植民地期の台湾人産業資本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小零細資本の成長を中心〉，《經濟論叢》155(2): 59-79。

高淑媛

2007 《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罐頭業為例》。臺北：稻鄉出版社。

堀内義隆

2001 〈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の米穀産業と工業化：粳摺・精米業の發展を中心に〉，《社会経済史学》67(1): 23-46。

2005 〈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台湾人小経営：工業化の周辺〉，《地域総合研究》33(1): 83-96。

2005 〈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中小零細工業の發展〉，《調査と研究》30: 23-44。

2008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工業の形成：製帽業を事例として〉，《日本史研究》556: 26-53。

2009 〈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機械市場の形成と機械工業の發展〉，《現代台湾研究》35: 36-56。

2010 〈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農村工業の發展と労働供給〉，《三重大学法経論叢》27(2): 45-62。

許乃昌

1926 〈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6: 10-13。

1926 〈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臺灣民報》127: 10-12。

1926 〈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臺灣民報》128: 9-11。

1926 〈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完)〉，《臺灣民報》129: 9-11。

1927 〈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上)〉，《臺灣民報》142: 11-12。

1927 〈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下)〉，《臺灣民報》143: 11-14。

連溫卿

- 1928 〈臺灣社會運動概觀〉，《臺灣大眾時報》創刊號：15-16。
- 1928 〈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6：12-14。
- 1928 〈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二〔按：三〕）：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7：13-14。
- 1928 〈臺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臺灣大眾時報》8：14。
- 1975 〈台湾に於け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実態〉，《史苑》35(2)：61-83。

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

- 2003 《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再版。

陳芳明

- 1998 《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2005 〈「中國改造論」：論戰與 20 年代臺灣左翼思想的傳播〉，收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第六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延續與斷裂》，頁 183-20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 2007 《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2 版。
- 2011 《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映真

- 2000 〈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6(9)=189：138-160。
- 2000 〈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臺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結束爭論的話〉，《聯合文學》17(2)=194：148-172。
- 2000 〈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16(11)=191：138-161。

陳逢源（芳園）

- 1945 〈書評：東嘉生著「臺灣經濟史研究を讀む」〉，《民俗臺灣》5(1)=43：45-46。
- 1926 〈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0：8-10。
-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一）〉，《臺灣民報》130：11-12。
-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二）〉，《臺灣民報》131：11-12。
-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三）〉，《臺灣民報》132：10-11。
-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四）〉，《臺灣民報》133：11-12。
-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五）〉，《臺灣民報》135：8-9。
-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六）〉，《臺灣民報》136：11。
- 1926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七）〉，《臺灣民報》137：11-12。
- 1927 〈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按：造論〕（八・完）〉，《臺灣民報》139：12-13。

陳翠蓮

- 2008 《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陶希聖

- 1934 〈編輯的話〉，《食貨》創刊號：29-30。

馮天瑜

2006 〈封建概念辨析〉，《社會科學戰線》2006(5): 251-255。

馮天瑜、樊良樹

2007 〈關於「封建」概念的對話〉，《社會科學論壇》2007(4 上): 133-136。

黃石輝

1928 〈「改造」之政〔按：改〕造（一）〉，《臺灣大眾時報》9: 13-14。

1928 〈「改造」之改造（二）〉，《臺灣大眾時報》10: 11-13。

黃宗智

1992 《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規範認識危機及出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黃俊傑

2006 〈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以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改造論」的辯論為中心〉，收於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頁 99-12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奧村哲

2004 《中国の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近現代史像の再構成》。東京：桜井書店。

葉榮鐘

2000 《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2000 《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緒形康

2013 〈1930 年代の封建遺制論争、資本主義論争におけるアジア〉，收於緒形康編，《アジア・デ
ィアスボラと植民地近代：歴史・文学・思想を架橋する》，頁 193-219。東京：勉誠出版。

趙曉華

2004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術研究與論争》。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劉進慶

1975 《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蔡孝乾

1926 〈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34: 10-13。

魯凡之

1987 《東方專制主義論：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

蕭阿勤

2010 《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所，第 2 版。

2012 《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國興

2003 〈中國往何處去：1930 年前後臺灣的左右論辯〉，《近代史研究》2003(2)=134: 44-76。

顧琳 (Linda Grove) (著)，王玉茹、張瑋、李進霞 (譯)

2009 《中國的經濟革命：二十世紀的鄉村工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Bartolovich, Crystal, Neil Lazarus (eds.)

2002 *Marxism, Modernity,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ndt, Loren

- 1989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1870-1937*.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Archie

- 2009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Ecco.

Cole, G. D. H.

- 2002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Eley, Geoff

- 2002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østa

-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østa (ed.)

- 1996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Gamble, Andrew, David Marsh, and Tony Tant (eds.)

- 1999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Kołakowski, Leszek (Author), P. S. Falla (Trans.)

- 2005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andauer, Carl 蘭道爾

- 1976 *European Socialism: A History of Ideas and Movement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Hitler's Seizure of Pow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Rawski, Thomas G.

- 1989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ssoon, Donald 薩松

- 2010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Shepherd, John R. 邵式柏

-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nowledge and Imagination of Taiwan's Socio-economic History: Taiwan's Social History Debate (1920-1930s) Reexamined

Wen-kai Lin

ABSTRACT

Between 1920s and 1930s, East Asia saw extensive scholarly discussion on Social History Debate. During the same era, there was an influx of Western modern social theories including liberalism, anarchism, and Marxism, thus contributing to a climate of influential Social History Debate. Among these social theories, Marxist ideology had the most profound impact on the modern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imagination among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Different theoretical concepts on Taiwan and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were developed and different opposing programs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form were formulated. Since the late 1980s, democratization led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discussion. Hence, Taiwanese scholars on literary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re-examined the essence of the Debate and its impact on Taiwan history, and used it as a weapon to get involved in Taiwan's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at that time. Of note is the significant change in knowledge on Taiwan and China's socio-economic history among socio-economic historians since the 1990s and the tot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movements and ideas in western societies and Japan. Nevertheless, the analysis of Social History Debate by Taiwanese scholars was still made on basis of prior and outdated knowledge, making these analyses fragmented and far from complete.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he Debate and its meaning in Taiwan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new knowledge on Taiwan and China's socio-economic history and global socialist history.

Keywords: Taiw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Chinese Reform Debate, Taiwan Socio-economic History, Global Socialist History